

王惠荣◎著

陈澧思想研究

CHENLI SIXIANG YANJIU

陈澧是广东近代著名学者之一，也是广东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传统音韵学、地理学、乐理、经学等方面均有显著成就。研究这样一位学者的思想，无疑将有益于中国近代学术史（特别是近代广东学术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澧 思想研究

王惠荣◎著

CHENLI SIXIANG YANJI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澧思想研究 / 王惠荣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 - 7 - 5004 - 7120 - 2

I. 陈… II. 王… III. 陈澧 (1810 ~ 1882) — 思想评论 IV. B2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863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刘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625

插页 2

字数 241 千字

定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清代学术以乾嘉年间盛行之考据学为大宗，如王国维所言：“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①然就清代考据学发展而言，其中心区域则在东南诸省，故梁启超有“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②的感叹。除此而外的各地区，考据学开展的状况则参差不齐，有考据之风稍强者，亦有理学盛于考据者。阮元督粤前岭南一带的学术文化大致属于后一种情况。

上溯明代，岭南学术盛行以陈献章为代表的白沙学派，有学者亦称之为江门学派、新会学派。黄宗羲《明儒学案》列有《白沙学案》的篇目，以两卷的篇幅做了重点阐述。陈献章论学近于陆九渊，具有心学一派风格，对日后阳明学派兴起不无启迪之功。故黄宗羲有“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③之评语。陈氏学术在岭南浸淫日久，一直延绵至清代。清嘉道间，阮元总督两广，创办学海堂，力倡考据学，使岭南学风为之大变。自是时起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23，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

②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1，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9页。

③ 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页。

2 陈澧思想研究

至清末，岭南学术思想几经变迁，大体经历了陈澧和朱次琦之汉宋学并举、张之洞之经世洋务共倡、康有为之今文经学张扬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此期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陈澧都是岭南学术思想变迁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无怪梁启超称其为“粤中两大师”之一：

咸同之间，粤中有两大师，其一番禺陈东塾先生澧，其一南海朱九江先生次琦也。东塾蚤岁著学海堂弟子籍，晚而为“学长”垂三十年；九江则以其学教授于乡。两先生制行皆极峻洁。而东塾特善考证，学风大类皖南及维扬。九江言理学及经世之务，学风微近浙东。然其大旨皆归于沟通汉宋，盖阮先生之教也。东塾弟子遍粤中，各得其一体。^①

钱穆亦称：

东塾生当乾嘉盛极之后，身值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正朴学考据盛极趋衰风气将变之候，而东塾为其过渡之人物。^②

陈澧（1810—1882），广东番禺人。字兰甫，一字兰浦，自号江南倦客。早岁读书于东厢书塾，后著《东塾读书记》，故有“东塾先生”的尊称。少肄业粤秀书院。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人，先后六赴会试，皆名落孙山。陈澧博览群籍，精思勤审，且热心教育。自道光十四年（1834）被阮元创设的学海堂聘为

①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1，第79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96页。

学长，至晚年主持菊坡精舍，致力于学堂教育凡数十年，育才无算，形成蜚声海内的岭南东塾学派。陈澧一生，潜心治学，笔耕不辍，著书百余种，主要有《周礼郑氏注》《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切韵考》《声律通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弧三角平视法》等书，涉及经史、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诗文等诸多领域，俨然一派儒宗气象。因此对于陈澧思想的研究，无论从阐发晚清学术思想的传承变迁，还是在挖掘岭南学术历史价值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关于陈澧研究的寂落现状，与其人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却极不相称。

以往学界关于陈澧的研究，多在学术史的论著中附带提到。梁启超、钱穆分别在他们所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都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他的学术成就。论述陈澧的论文则有罗香林、王韶生、何佑森等港台学者在20世纪60—70年代发表的一些专题性成果^①。近年来，随着岭南文化研究的升温，关于陈澧的研究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②。欣闻中山大学李绪柏教授主持有关陈澧研究的课题，当会推出体现这一课题研究新水平的学术力作。于今人而言，陈澧的名气似乎逊色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诸贤，然而，作为一代儒宗，陈澧于传统学术靡不深究，诸如经学、子学、小学、音韵、声律、舆地等，无不在他学术视野之内。这些内容对于当下学子自然是生疏

① 罗香林：《陈兰甫与广东学风》，《新亚生活》1961年第3卷第14期；王韶生：《论陈兰甫先生之经学》，《崇基学报》1962年第2卷第1期；何佑森：《陈兰甫的学术及其渊源》，《故宫文献》1971年第2卷第4期。

② 罗伟豪：《从陈澧〈切韵考〉的“明微合一”看广州音》，《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8期；谷建：《陈澧〈切韵考〉“用字偶疏”条例之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绪柏：《陈澧与汉宋调和》，《南开学报》2005年第6期等等。

的、隔膜的。研究陈澧的学术思想首先要具备许多关于传统学术的基本知识，要有甘于坐冷板凳、不畏困难的精神。这无疑是一个具有艰巨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这本奉献给读者的《陈澧思想研究》，是王惠荣同志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王惠荣君是我的学生，曾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一直用力于中国近代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她为人质朴，勤奋好学，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学习、研究传统文化学术，选择《陈澧思想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从事比较枯燥艰涩的学术史研究，在今天普遍存在的学风浮躁、不能安心读书的氛围下，是要有些勇气，并要为之付出艰辛劳动的，其笃志史学的学术追求，尤其令我欣慰。迄今为止，国内还未出现专以陈澧思想为论题的著作。可见，以《陈澧思想研究》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无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纵观全书，我认为有以下两点值得肯定：

一、作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和借鉴历史学、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对陈澧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学界第一部专题性研究陈澧思想的学术专著，具有学术创新意义。

作为一代儒宗，陈澧无书不读，学识渊博，思想博大精深，然而，作者并未面面俱到地平铺直叙，而是以纵横结合、虚实相兼的写作思路，在总体论述陈澧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点抓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学术经世思想和教育思想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比较深入地展现了陈澧思想的整体面貌和本质性特点。其中不乏精当之论。作者在分门别类地阐述陈澧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将其学术思想的特征概括为“通”，具体论述了陈澧主张“读经”要“通读”，汉宋学要“贯通”，中学、西学要兼通，达到了“通儒”的境界。正如作者所说：

这种“通儒”，应该不仅是指学问上的“通”，还应指思想上能达到“通”的高度。陈澧学术思想上的“通”主要是通过他的学术主张与学术态度来体现。他重视士大夫之学，提倡人通一经之学，通读注疏，推崇郑玄、朱熹等，都是这种“通”的具体表现。^①

作者还着重阐述了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关于“学术经世”一词，海外学者曾有所论述。作者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参合己意，做出自己的解释。她说：

学术经世并不等同于经世之学。经世之学主要是指关乎治理国家的知识和技术；学术经世则是经世致用的重要途径之一，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或参与组织学术文化事业来间接取得经世效用。……陈澧学术致用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无论是提倡汉宋调和还是主张读注疏，强调通一经之学，都是因偏救弊，间接达到经世目的。^②

作者的论述尽管不尽完善，但毕竟在陈澧研究的问题上提出一家之言，且言之有据。

陈澧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而且执教数十年，为岭南培养出大量人才。毋庸置疑，陈澧教书育人的指导思想与其学术思想关系密切，或者说他的重要学术思想在其教育实践中都有具体体现。这也是《陈澧思想研究》的一个关注点。作者通过“教育活动”、“教育宗旨”、“对旧教育体制的批判”和“育才

^① 王惠荣：《陈澧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打印本，第37页。

^② 同上书，第95页。

观”四个方面对陈澧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考察。陈澧所处时代正值内忧外患同时并存的晚清，他虽存治乱之心，却没有行政的权位，因此陈澧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其救世的抱负，也就是作者在文中所讨论的学术经世。

二、史料丰富，征引翔实。

史学研究理应把收集、研读、解释史料的工作放在首位，因为这是开展研究的起点和基础。而“一网打尽”、“竭泽而渔”，则是对史料收集的一种必要的要求。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注重挖掘史料，把学术论点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先后查阅陈澧有关文献资料 28 种，其中包括大量出版于清代的刻本，如《东塾类稿》（咸丰年间刻本）、《番禺陈氏东塾丛书》（咸丰至光绪年间刻本）、《朱子语类日钞》（光绪年间刻本）、《菊坡精舍集》（光绪二十三年刻本）以及《水经注西南诸水考》《三统术详说》等，为论文提供了坚实的材料基础。在对于问题的阐述中，能够做到梳理史料，详确征引，不作虚妄之论，体现了作者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

一部学术著作难以尽善尽美。该书稿同样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与不足，在研究理论的运用和对于具体问题的阐述上，都有不成熟之处。但是，与本书所体现出的优长相比，这些不足毕竟是次要的、属于第二位的，不会影响它所应有的学术价值。

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衷心希望作者在今后的科学研究中，不断加强个人学识修养，发扬勤奋、扎实的学风，为弘扬祖国传统学术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史革新

2008 年 3 月 18 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陈澧的学术渊源	(11)
第一节 近代广东学术发展概况	(11)
一 道光前之广东学风	(11)
二 道光以降学风之演变	(15)
第二节 陈澧学术渊源	(21)
一 生平与师友交游	(22)
二 陈澧与学海堂	(25)
三 遥宗顾炎武	(30)
第二章 陈澧的学术思想	(34)
第一节 陈澧学术思想概述	(34)
一 陈澧的学术成就	(34)
二 陈澧学术思想发展脉络	(53)
三 陈澧学术思想之特征	(58)
第二节 陈澧的经学思想	(65)
一 经与经学	(65)

2 陈澧思想研究

二 《东塾读书记》的著述缘由与论学宗旨	(70)
三 陈澧经学思想之透析	(74)
第三节 陈澧的汉宋调和思想	(98)
一 清代汉学家与程朱理学	(98)
二 学术取向介于王懋竑、程瑶田之间	(124)
三 考据学思想	(136)
四 力平汉宋之争	(142)
五 小结	(150)
第三章 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	(154)
第一节 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社会思潮及学风的变化	(154)
一 经世致用思潮的重兴	(154)
二 岭南的经世学风	(159)
第二节 学以致用	(163)
一 学术经世思想之形成	(163)
二 学术经世思想之具体表现	(166)
第三节 陈澧学术经世之评价	(187)
第四章 陈澧的教育思想	(189)
第一节 教育活动	(189)
一 菊坡精舍	(191)
二 东塾学派	(200)
第二节 教育宗旨	(214)
一 行己有耻	(214)
二 博学知服	(218)
第三节 对旧教育体制的批判	(222)
一 主张科举改良	(222)

二 分科教学——孔门四科	(232)
第四节 育才观	(238)
一 重视启蒙教育	(238)
二 “人通一经之学”	(242)
第五章 近代广东汉学	(245)
第一节 近代广东汉学与扬州学派	(245)
一 近代广东汉学与扬州学派	(245)
二 近代广东汉学巨擘	(257)
第二节 陈澧学术思想与朱次琦、朱一新之异同	(259)
一 陈澧、朱次琦、朱一新学术思想之异同	(262)
二 陈澧、朱次琦、朱一新对西学认识之异同	(271)
结语	(277)
参考文献	(284)
后记	(295)

绪 论

一

陈澧（1810—1882），字兰甫，一字兰浦，广东番禺人，因其读书处曰东塾，故称东塾先生。陈澧是近代岭南著名学者，学宗汉学，却无门户之见，主张汉宋调和。晚清是广东学术发展的又一高峰时期。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创建学海堂，广东学风为之一变，由原来的崇尚科举而转为著述考据。陈澧即是在此种风气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汉学在近代广东的兴盛既得力于阮元的提倡，复受益于广东本地学者的响应，而陈澧恰是推动汉学在广东持续发展的关键人物。他的学术思想及著述活动影响了一大批广东新一代学者，这种影响甚至持续到民国初年。因此，对陈澧的学术思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全面展现一代儒宗的学术风貌及思想特征，给后代学人以启发、激励，而且也可从对他的研究中揭示近代广东及中国学者的一般思想状况。

首先，陈澧是继阮元之后又一个对近代广东汉学有着深刻影响的学者。他的学术活动与广东学界有着密切联系。对他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广东学术发展的真实状况。

广东地处南疆，自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尤其是近代开埠通商以来，其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更趋紧密。在

2 陈澧思想研究

这样的环境中，西学对广东学术的影响举足轻重，似乎是题中应有之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梁启超在其《三十自述》中说：“十五岁……余方游学省会……时肄业于省会之学海堂，堂为嘉庆间前总督阮元所立，以训诂词章课粤人者也。”^① 戊戌维新前的广东并非一般人想象中的西学盛行，而是仍然以中学为主，当时广东所崇尚的学术是在江淮已呈衰势的汉学。陈澧自始至终经历了汉学在广东的发展，并且是其中的中坚人物，以他为首的东塾学派的形成，推动了广东汉学的高涨。通过对陈澧的研究，我们可以对广东的近代学术有进一步的了解，不但有助于人们澄清戊戌维新前的通商口岸以西学为主流的模糊认识，而且也可以借此发现开埠通商近半个世纪的广东，其学术发展的真实状况。

陈澧一生著述丰富。据中山大学的吴茂燊、黄国声两位学者考证，陈氏平生除肆力于经、史、子部外，旁及天文、地理、文字、音韵、乐律、算术、诗词、古文、书法、摹印、绘事，各种著述约 116 种^②。陈澧的著述大部分为考证之作，如《切韵考》《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声律通考》《说文声表》等，这些著作不但对广东汉学的发展有所影响，而且及于岭南以外。“吾粤文风，自清咸同以降而浸盛，近百年间人才辈出，著述益丰，且有度越中原之势”^③，即指此而言。另外，陈澧除著述丰富外，还为广东培养出众多汉学人才。陈澧先后在广东著名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执教四十余年，可谓桃李满天下。陈澧讲学不自立宗旨，取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① 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5 页。

② 包括已刊、未刊、已成、未成著作。吴茂燊、黄国声：《〈陈东塾先生著述考略〉订补》，《中山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

③ 冯秉芬等：《广东文献续编序》，转引自李绪柏《清代广东文化的结晶——东塾学派》，《广东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

勉励诸生。在他的教育下，广东近代涌现了一大批汉学人才，如桂文灿、陶福祥、廖廷相、黎永椿、林国赞等。因此，陈澧一生的活动都与广东汉学的发展紧密相连。

广东汉学在近代的发展，可以说是乾嘉考据学在局部地区的延续。陈澧的学术思想及主张反映了清代汉学家在汉学盛极而衰时，一部分学者的思想倾向和变化。从中也可发现清代汉学的衰落，不仅有外部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弊端，尤其是发展到末流阶段。

陈澧在学术上坚持摒除门户之见，兼采汉宋。这一主张虽然在道、咸时期已不是什么新鲜见解，但是对于当时汉学正盛的广东来说，却有很大影响。正是由于学术思想上的通融豁达，才使得陈澧在对待诸子学和西方技艺上，没有同时期广东另一位大儒朱次琦那样的偏见。陈澧不反对中国人了解西方事物，甚至赞成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①人。他的这种灵活的治学态度带动了他的学生。广东近代的汉学风气虽盛，但不排斥义理的发挥，且以程、朱为旨归，这是近代广东汉学不同于乾嘉汉学的地方，这一显著差异，与陈澧也有重要关系。总之，陈澧是广东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近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史上也有一定影响。对他的研究，从近代学术史的角度来说，也是意义匪浅。

其次，广东在近代处于多事之秋。政治事件层出不穷，政治人物频繁亮相，这些历史事件及人物几乎吸引了现代研究者的全部注意力，戊戌维新前广东的传统学术不易进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因而，其时在广东近代学术界相当活跃的一些学者受到的重

^① 朱维铮：《东塾读书记·导言》，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页。

视远远不够，如广东近代有名的两大儒朱次琦、陈澧。

陈澧从事教育四十余年，虽然他没有专文表述自己关于教学方面的心得与经验，但是在与友人的通信及一些零散文章中却已流露出他的教育思想。如他反对八股时文，认为“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①，主张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改革旧有的科举制度。他主持的菊坡精舍，办学以顾炎武的名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宗旨，在道德与学问上同时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这在近代中国面临异族凌迫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他的这种教育思路对今日的中国教育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澧在做学问方面，思想很灵活，既反对一味考证，皓首穷经，又反对空谈义理。他之所以推崇郑玄、朱熹，是因为他们二人对考据、义理兼而取之，无所偏废。这一思想多次体现在他的文章著作中。陈澧所倡导的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学术观点，而且也是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的广东学者。民国年间，广东学者在传统学术领域大放光彩，不能说与陈澧没有丝毫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对陈澧思想做系统的研究，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时至今日，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自古以来，以史为鉴就是中国史家治史的基本宗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指导。中国当代文化、学术的繁荣，需要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所以，对陈澧这样一位在传统音韵学、地理学、乐律、经学方面有显著成就的近代学者，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陈澧的教育、学术思想对今天的文化建设仍有所启发和帮助。

^① 陈澧：《东塾读书记·科场议》，第351页。

二

陈澧虽然在广东近代学术史乃至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其本人生前既没有做过高官，也没有参加过重大社会活动，一辈子在教书与著述中度过。相对于近代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与政治人物来说，是那样的沉寂与冷清。因此，现代学者对他的研究极少。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有见到对陈澧思想做系统研究的专著。

陈澧在近代史上虽不很引人注目，但对于他的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却并非无人提及。如章炳麟、刘师培、钱穆等人都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到过陈澧，尤其是钱穆先生，对陈澧所持学术不分门户的治学态度及所提倡之“人通一经之学”^①的新学风大加赞赏，对其学术人品也推崇备至。然而，出身汉学的刘师培、章炳麟对陈澧却持非薄态度，认为：“澧学钩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②“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佗书，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③这些学者对陈澧或毁或誉，不一而足。

民国时期学术著作中，涉及陈澧稍微详细的有钱穆先生的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3页。

②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③ 章太炎：《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